

# 日本外交史

上册

〔日〕信夫清三郎 编

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问题研究所 译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 日本外交史

1853—1972

〔日〕信夫清三郎 编

每日新闻社发行

## 内部发行

# 日本外交史

上下册

〔日〕信夫清三郎 编

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问题研究所 译

---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1/32 31印张 739千字

1980年8月第1版 1980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5,800册

统一书号：11017·474

定价：3.50元

# 目 录

序 .....	1
凡例 .....	8
序论 开国前夕的国际关系 .....	10
第一节 三种国际秩序 .....	10
第二节 西洋的冲击：华夷秩序的崩溃 .....	29
第三节 西洋的冲击：日本的外来压力 .....	36
第四节 日本的对策 .....	41
第一章 开国（1853——1867） .....	56
第一节 被强制开国 .....	56
第二节 对外关系的正规化 .....	69
第三节 外交的混乱和国内政局的急转直下 .....	82
第四节 幕府外交的崩溃 .....	99
第二章 万邦对峙（1869——1876） .....	116
第一节 明治维新与近代外交主体的形成 .....	116
第二节 迈向近代外交 .....	130
第三节 确立国权的意图 .....	139
第四节 大久保时代的外交 .....	150
第三章 大陆政策的形成（1877——1883） .....	160
第一节 釜山租界的设置 .....	160
第二节 修改条约交涉的具体化 .....	170
第三节 对琉球的处理 .....	180
第四节 壬午兵变 .....	191

<b>第四章 脱亚入欧(1884——1891)</b>	199
第一节 甲申政变	199
第二节 鹿鸣馆外交	212
第三节 大隈的修改条约和颁布宪法	222
第四节 大陆政策的拟定	233
<b>第五章 日清战争(1892——1896)</b>	246
第一节 修改条约	246
第二节 日清战争的开始	258
第三节 下关条约	271
第四节 三国干涉	282
<b>第六章 日俄战争(1896——1905)</b>	294
第一节 日本、俄国在朝鲜	294
第二节 瓜分中国的危机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	303
第三节 俄国对满洲的占领与日本	317
第四节 战争与和谈	330
<b>第七章 帝国主义政策的展开和国际关系的重新组合</b>	
(1905——1914)	344
第一节 日俄战后的新形势	344
第二节 围绕满洲的日美俄关系	354
第三节 辛亥革命和大陆政策的分歧	364
第四节 维护宪政运动和大陆政策	375
<b>第八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b>	387
第一节 参战外交	387
第二节 战时外交	400
第三节 中国的新形势和对华政策的转变	415
第四节 俄国革命和干涉苏联的战争	426

# 目 录

<b>第九章 华盛顿体系 (1918- 1922)</b> .....	443
第一节 凡尔赛体系 .....	443
第二节 革命和反革命 .....	456
第三节 华盛顿体系 .....	470
<b>第十章 政党政治和外交 (1921--1929)</b> .....	486
第一节 日苏交涉 .....	486
第二节 币原外交 .....	499
第三节 田中外交 .....	517
<b>第十一章 十五年战争的开始 (1929—1935)</b> .....	539
第一节 伦敦裁军条约和统帅权的争论 .....	539
第二节 满洲事变 .....	548
第三节 在满洲建国 .....	564
第四节 退出国际联盟 .....	578
第五节 经济外交 .....	590
<b>第十二章 日中战争 (1935--1939)</b> .....	596
第一节 国际法西斯主义与反法西斯主义统一战线 .....	596
第二节 侵略华北 .....	601
第三节 日德防共协定 .....	607
第四节 日中战争 .....	615
第五节 外交的混乱 .....	633
<b>第十三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 (1939—1945)</b> .....	642
第一节 重新瓜分世界的设想 .....	642

第二节	日苏中立条约和日美谈判·····	659
第三节	大东亚战争·····	676
第四节	战败·····	692
<b>第十四章</b>	<b>占领 (1945—1952)</b> ·····	<b>705</b>
第一节	美国的对日政策·····	705
第二节	占领和占领政策·····	716
第三节	冷战和占领的长期化·····	736
第四节	亚洲的革命与事实上的媾和·····	756
第五节	朝鲜战争与单独媾和的实现·····	773
第六节	媾和条约与安全保障条约·····	782
<b>第十五章</b>	<b>安保体制 (1952—1965)</b> ·····	<b>792</b>
第一节	日苏复交·····	792
第二节	改订安全条约·····	815
第三节	日韩条约·····	835
<b>第十六章</b>	<b>亚洲的核安全保障 (1965—1972)</b> ·····	<b>862</b>
第一节	越南战争与日本·····	862
第二节	亚洲的核安全保障与归还冲绳·····	876
第三节	恢复日中邦交·····	896
<b>索引</b> ·····		<b>914</b>
一	人名索引·····	915
二	事项索引·····	937

## 序

本书是一部日本外交通史，起自 1853 年柏利来航、日本开国，止于 1972 年日中恢复邦交，凡一百二十年。虽然是一部通史，却并不是对外交史上所有问题等量齐述的概要说明书。本书的目的在于着重分析日本外交基本政策，以此为中心而形成一种史论。

本书是我们八人共同研究的成果。这项研究开始于 1969 年 1 月。当时，在要不要延长《日美安全条约》的问题上发生了所谓“1970年的抉择”的问题，作为历史工作者应如何对待这个问题呢？我们的共同研究就是受到这个思想的推动而开始的。面向未来，日本的外交，应该作出怎样的抉择呢？我们终于认为，为了从根本上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对过去日本外交所曾作过的重要抉择研究清楚，从历史上对日本外交作出一个展望。于是我们就以重要抉择问题为中心，着手对近代日本外交史进行系统的研究。当时，我们对外交下了一个定义：“为了实现国家利益（以国家利益形式表现的阶级利益），使用包括武力在内的一切可能的手段和方法所进行的国家对外活动”，把这种国家对外活动的历史称作外交史。我们之所以要对外交和外交史下一个大致的定义和规定其内容，并不是要对外交概念的当否进行争论，而是因为有必要按照我们的研究目的来规定它的含义。这就是说，我们认为，要想从对外活动这个侧面解释清楚近代日本国家的产生和发展、帝国主义的扩张、崩溃和复活的历史时，若把外交规定为和平时期的“交涉”（negotiation），就不能把在经历多次战争中，闯过发展、扩张、崩溃

和复活这种过程的历史特征刻画出来。本书之所以不是概要说明书，正是由于把叙述集中于刻画这种历史特征上；本书之所以把形成史论作为目的，正是由于本书的存在价值完全取决于对这种历史特征的刻画成功到什么程度。

我们的工作就从划定日本外交史的分期开始。我们把当前的研究对象限定于从明治维新到战败，一面讨论分期，一面勾画日本外交史的轮廓，并计划以这种轮廓为基础着手编述通史。截至1971年5月，在两年零四个月期间，我们反复进行了约五十次讨论。同年5月6日，在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的春季研究大会上，我们以《近代日本外交史的分期》为题，报告了讨论结果并征求意见。报告的内容和所提意见的摘要已在日本国际政治学会机关杂志《国际政治》1971年度第一号（1972年4月出版）中，用日本外交史研究会的名义，以《近代日本外交史的分期》为题发表。该文中的分期表，经我们对照全书作了修订增补。为了读者的方便，分别附于全书各卷之后。对分期得出了大致结论之后，我们就着手编述通史，亦即开始编写本书。1971年5月以来，召开研究会约达二十次，每人所分担执笔的原稿均复写分发全体人员，全体人员读了全部原稿，每人加注意见后交还执笔人作进一步修改，然后由信夫清三郎统编，再退回执笔人作最后的修改，这样才完成了原稿。执笔者的分工如下：

序论第1节	第1—2项	中山治一
序论第1节	第3项	藤村道生
序论第2—3节		中山治一
序论第4节		藤村道生
第1—2章		毛利敏彦
第3—5章		藤村道生

第6—7章	中山治一
第8—10章	冈本 宏
第11—13章	安部博纯
第14章	信夫清三郎
第15—16章	谷川荣彦

石川捷治虽未参加本书的执笔，但作为研究会的成员曾参加讨论，阅读原稿和提出意见，还编制了索引，并负责研究会的各种日常事务。

对日本外交上的重要抉择进行历史的考察，这是贯通全书的课题。联系这个课题，作为一部通史，本书特别着重阐述了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个着重点是探讨围绕着日本外交的国际秩序原理的对立。很多历史书都把日本的开国过程当作欧美资本主义各国形成世界市场的过程，以及中国和日本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过程来加以叙述。从结果来说，确实是这样。但是，在揭述这个过程的时候，如果不同时把它作为不同国际秩序原理的对立来描述，恐怕就不能明确抓住（日本外交的）抉择问题；从而，也就不能彻底理解开国的过程，以及由此发展到日清战争的过程。这就是，把世界逐步纳入资本主义而不断形成世界市场的，虽然是欧美各国，即本书所谓“西洋国家体系”，但它们来到亚洲后，首先迫使开国的是中国，而中国具有与“西洋国家体系”不同的独自的国际秩序原理，即所谓“华夷秩序”；其次迫使开国的是日本，它也具有与“西洋国家体系”不同的独自的国际秩序原理，即所谓“大君外交体制”。具有独自的国际秩序原理，这使日本在作出抉择时造成了什么样的条件？与华夷秩序方面的抉择相比，它使日本的抉择具有怎样的特征？又使日本和中国的后来发展进程出现了怎样的差异？我们之

所以在序论中论述了《开国前夕的国际关系》，并企图从原理上阐明三种国际秩序，就是希望找出正确回答这个问题的线索。

我们的第二个着重点是日本对亚洲的外交。日本本身位于亚洲，在日本外交中，对亚洲各国的外交不论在质或量上都占最大的比重，这一点本来是理应如此的。但问题在于，日本并不想依靠亚洲的联合来对抗西洋国家体系的冲击，而是立即决心加入西洋国家体系，企图作为西洋国家体系的一员，反过来统治亚洲各国。这样，“脱亚入欧”的日本就挑起日清战争，取得胜利，并在亚洲开展了旨在以亚洲统治者姿态凌驾于亚洲之上的外交活动。作用引起反作用，亚洲各民族对于日本侵略的抵抗也随着日本脱亚入欧的过程而爆发，日益激烈，势将迫使日本做出新的抉择。但是，日本却在经过战斗而抉择的道路上一意孤行，而在从朝鲜和满洲（中国东北）开始，直到妄图征服“大东亚”的十五年的战争中，终于遭到失败。现在，日本又在作为“经济动物”<sup>①</sup>不断侵略亚洲各国，正在再次引起亚洲各民族的抵抗。我们对历史的责任和对历史所应进行的反省，既然主要在于我们与亚洲各民族的相互关系之中，那么，系统地叙述对亚洲的外交，系统地阐明其意义，反过来就恰恰可以使日本外交的一贯特点更加清楚。对欧美的外交，今天固然作为经济高度成长<sup>②</sup>的结果正在开辟独自的领域，但在过去，在许多情况下却是围绕着对亚洲的外交而展开的。

我们的第三个着重点是探讨日本对外机关及外交主体的结构与外交政策的关系。我们系统地追溯了日本外事机关的状况及其演变，力求把其背后的外交主体的结构阐述清楚。外交政策是通过对外机关来实行的，而对外机关的状况又常常反过来规定政策

---

① 经济动物：指擅长经济活动的日本人。——译者

② 经济高度成长：战后六十年代池田内阁提出的施政方针，其实质是与美国资本相结合，迅速发展日本资本主义。——译者

的方向。战前，日本和欧美的自由主义乃至民主主义的学者和思想家，总是批判处于帝国主义阶段的日本外交是“双重外交”，批判产生这种双重外交的政府机构是“双重政府”。但所谓双重政府是什么？双重外交是什么？这与按照《大日本帝国宪法》建成的日本国家机构又处于什么样的关系？弄清这个问题，应当是理解战前日本外交特点的又一个关键。那末，战后又怎样呢？根据战后日本宪法建成的国家机构又给外交主体和外交政策方面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呢？弄清这些问题，不单是为了贯通战前战后来理解日本外交的特点，而且对于正确研究外交的统一性和民主管理问题也会提供一些基础资料。

我们写作本书的意图，在叙述中到底实现了多少，有待于读者的评论。在本书编写过程中，我们进行了很多争论。关于分期的争论已见于日本国际政治学会机关杂志上发表的前述论文，此外，关于对攘夷运动的评价问题，关于战前日本国家机构（天皇制）的性质，以及应否把被占领期间作为一个“时代”来处理的问题等等，意见也有很多分歧，进行了争论。我们八人在思想和理论上并不完全一致，有争论是很自然的，我们没有强求一致；有时我们尊重执笔者的个人见解，有时求同存异，只取相互一致点。天皇制问题与双重政府和双重外交问题密切联系，我们在确认双重外交之存在这一点上求得相互一致，共同倾注全力对双重外交作出准确的叙述。这并不是为了回避解决争论的困难，而是因为我们确信，为了使争论不致流于一无所获的相互争吵，而能取得创造性的解决，首先准确地把握双重外交的事实，是我们当前最重要的课题。我们采取的一贯方法是首先集中全力于确定事实，尽量让事实本身说话。

由于共同研究是一项集体工作，因而也就有相应的困难。共同研究的成员具有各种各样的思想和理论，在哪些方面应求得一

致呢？如果说这是第一个困难，那么，第二个困难就是，如何把每个成员各自头脑中酝酿着的见解和共同研究之间的关系协调起来。共同研究是互相交流情况，通过交谈和讨论加深各自的理论，它能给研究人员带来关在研究室里无论如何也无法获得的知识。但学问既然毕竟是以每个研究人员的脑力劳动为基础，那么，在共同研究当中，即使探讨共同的主题，每个人也当然会在头脑中不断勾画出自己独特的课题。怎样使这种各人特有的课题和共同研究工作协调起来？这是共同研究中的困难之一；共同研究如果持续太久，反而会妨碍个人单独研究的课题，结果就将导致共同研究本身的失败。因此，必须在一定的期限之内，把共同研究的成果概括出来，就成了最重要的要求。如何设法作到这一点，也是我们绞脑汁的一个方面。现在，共同研究工作基本告一段落，我们每个人将会各自带着共同研究过程中酝酿已久的课题回到自己的研究室中去。

日本外交史的研究，在日本是一门年轻的学问，甚至可以说是战后才兴起的学问。固然，战前也有日本外交史的研究，也留下不少成果，但在缺乏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的战前，自由评论外交是不允许的，日本外交史的研究从而也就受到很大的制约。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曾以笔锋向战争和法西斯主义进行过战斗的清泽渊氏，对日本外交的研究状况说过如下的话，这是1934年的事情。

“在日本，最受轻视的部门是外交。不仅在政治意义上如此，在学术乃至著作的意义上也是如此。……”

“这是一门在日本最不受赏识的学问。所以关于这方面的著作少得令人难以置信。在书籍出版方面，据说日本比世界任何一国都占优势，但唯有关于外交方面，我想就不能自豪了。”（《外交时

报》第712号,1934年8月,第20页。)

在日本败局已定之时,清泽浏氏就严肃认真地考虑日本的未来,计划设立外交史研究所,筹措资金,先办了一个小型的研究会。1944年秋,我也应邀出席了在东洋经济新报社一个房间里召开的研究会。我第一次见到长谷川如是闲氏也是在这次会议上。1945年,又应邀到私邸拜访了清泽浏氏。记得那是在初春季节,根据最近出版的他的《黑暗日记》,是3月2日。在他接待我的书斋里,桌子上摆着一本1936年出版的拙著《论外交》。在这本小书的序言里,我举出了他的上述文章,并且说“一般国民对外交史的如此无知,几年来就为法西斯主义造成了最良好的温床和孕育它的母胎”。也许就由于这篇序言,他接待我时,才把这本拙著摆在桌上。话题也就由此开始,转到拙著的内容,谈到双重外交;据他在《黑暗日记》中的概括叙述是:年轻的我,初生犊不怕虎,谈到想要写一部与他的两卷本《日本外交史》不相上下的外交史,表达了“写一部标准的外交史”的意图。我带去他的一部著作,请他签上名,心里热呼呼地辞别了他。我表示希望,如果外交史研究所开始工作,一定竭尽全力参加,他也邀我参加。可是,此后不到三个月,5月21日,他竟未等到战争结束,就突然逝世,一切也就完了。如果他能活到战后,并使外交史研究所正式成立起来,那么,我在战后走的步伐也可能会不同的。战后二十九年,外交史研究从一切限制中获得解放而迅速发展起来,在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完成了本书的著作和编辑的今天,我想起了清泽浏氏的和蔼面容,想起他当年为了招待我拿出本来就无多的小块年糕<sup>①</sup>,我们俩每人一碟,一边吃着,一边漫谈外交史研究问题时难忘的情景。

1974年1月29日

信夫清三郎

<sup>①</sup> 一种节日食品。日本风俗以3月3日为女儿节。这天吃用糖和酱油等作料烤焦了的小方块年糕。——译者

## 凡 例

1. 幕末维新时期期的日本人都有很多名字。例如，西乡隆盛就有：小吉、吉之介、吉兵卫、吉之助、隆永和隆盛等名字，又号南洲，有时为避社会耳目也叫过菊池源吾，大岛吉之助和大岛三右卫门等等。但是，本书不论他在某些时候用过什么名字，都统一使用最通称的“西乡隆盛”。

2. 初次提出人物姓名时，本应记其全名，但为了避烦就简，特别是对欧美人，很多场合只记其姓。全名和原文则写在下册末尾的索引里。索引中未写的则是由于尚未查清。

3. 关于人物的敬称，即使是现在还活着的人物也予省略。因为都是作为历史上的人物而写入本书的。

4. 编制索引时，朝鲜和中国的人名、地名，除了例如ソウル（汉城）或者シャンハイ（上海），其原语读法已经通行者外，均按日语读法。朝鲜人的“李”，现在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读作Li(Lee)，而在南朝鲜却读作Yi(Yi)；至于当时的正确读法，在朝鲜本国未得一致之前，我们无法解决。关于中国，我们未用欧美人的读法，也是在希望由中国规定正确的读音。

5. 年代全部使用公元和阳历。在明治5年（阴历）12月3日改为明治6年（1873年）1月1日以前，日本本来使用阴历，但本书已经全部换算为公元和阳历。关于阴阳历的对照，可参考外务省编辑的《近代阴阳历对照表》（1951年出版，原书房于1971年翻印）。

6. 引用原始资料用“ ”号标明，并将原文的片假名改为平假

名。至于当时使用的“阿兰陀”，笔画烦琐，则改写为通俗易懂的“荷兰”。在引文中，凡用（）符号所加的注释，都是原文所有；凡用〔〕符号的注释则是本书著者所加。

7. 关于出处，仅就有关重要政策或论点在脚注中注明，其余概予省略。脚注所引文献，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版的，都标明了出版社，战前的书籍则不予标出，因为有很多出版社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8. 日本外交史的基本资料有《日本外交文书》，目前仍在陆续刊行中；本书编写时能够利用的是“大正九年第二册上卷”以前的部分。

9. 日本外交史的年表以外务省编辑的《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1840—1945》最为正确（两册，日本国际联合会，1955年出版；1965—1966年由原书房翻印，两册）。该书收录了条约等主要文书，可以兼作辞典使用。不仅限于外交史的一般年表，以岩波书店編集部编写的《近代日本总合年表》（岩波书店，1968年）最为详细。在辞典中，查阅较便的有，京都大学文学部国史研究室编，《日本近代史辞典》（东洋经济新报社，1958年）；朝日新闻社编，《史料明治百年》（朝日新闻社，1966年）；远山茂树、安达淑子合编，《近代日本政治史必携》（岩波书店，1961年）和日本近代史研究会编，《日本陆海军的制度、组织、人事》（东京大学出版会，1971年）等等。为了查阅有关日本外交史的文献，以英修道编写的《日本外交史关系文献目录》（两册，庆应义塾大学法学研究会，1964年—1965年）最为方便；该书出版后，日本外交史的主要概说书有鹿岛和平研究所编著的《日本外交史》（本卷三十三册，别卷五册，鹿岛研究所出版会，1965— ），具岛兼三郎的《近代日本外交小史》（评论社《教养丛书》第31种；评论社，1972年）和池井优的《日本外交史概说》（庆应通信，1973年），后两本书都附有文献介绍。

# 序论 开国前夕的国际关系

## 第一节 三种国际秩序

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欧美各国要求亚洲各国开国时，亚洲各国大体上有两种国际秩序。亚洲最大的国家中国，把朝鲜、安南等邻国作为藩属，形成一个特殊的国际秩序，即“华夷秩序”。日本，古代且不说，足利时代（1336—1537年）曾作为藩属国加入华夷秩序，但自从丰臣秀吉挑起对明朝的战争，断绝了对中国的藩属关系之后，德川幕府就形成了以自己为中心的特殊的国际秩序，即“大君<sup>①</sup>外交体制”。中国的“华夷秩序”和日本的“大君外交体制”，与欧美各国所形成的“欧洲国家体系”不同，是建立在特有的原理之上的。因此，中国和日本同欧美各国之间近代国际关系的确立，才特地采取了中国和日本的“开国”这一特殊形态。

### 一 华夷秩序

被称为文禄、庆长之役<sup>②</sup>的日（本）明（朝）战争（1592—1593年；1597—1598年），断绝了足利义满时代以来断断续续保持着的日本和明朝的正式邦交。现在，据判定为1587年明朝的记载是，日本于1381年曾答应每十年向明朝朝贡一次，1403—1551年间，有时朝贡<sup>③</sup>。这个事实意味着，至少从明帝国方面来看，在一个半世

① 大君：当时日本幕府和西方各国都称幕府的将军为大君。——译者

② 文禄、庆长之役：指丰臣秀吉所发动的侵略朝鲜战争，一次发生在1592年即文禄元年，一次发生在1597年，即庆长二年。两次战役均以失败而告终。——译者

③ 费正清、邓嗣禹合著：《清代朝贡制度》，《哈佛亚细亚研究杂志》，第6册，1941年，第151页。

纪多的时间里，日本是以明朝为首的东亚国际秩序的一员。

1368年，蒙古王朝元帝国灭亡，作为汉族国家的明王朝建立，不久，便向建设一个超越汉、唐而在中国历史上大放异彩的强大帝国的方向迈进，这也就意味着要把汉朝以来一直在观念形态上保持下来的中华帝国复兴起来。汉民族自古以来世代相承的帝国观念，随着明帝国的建成，开始作为一种现实的国际秩序而明确显现出来。

明太祖（洪武帝）在建国之初就“诏谕”四邻各国，促令朝贡，并对接受“诏谕”的各国国君授以金、银印章，发给勘合符<sup>①</sup>，并对贡期、进贡土产的手续、对使者带来的礼物所付代价等均有详细的规定。凡接受“诏谕”前来朝贡的国家，既可以得到承认其在东亚国际秩序中的安定地位，又可以得到贸易的利益。接着，在第三代皇帝、即成祖（永乐帝）时代（1402—1424年），又征服了安南王国，前后五次讨伐鞑靼（蒙古族）部落，招抚女真族，向黑龙江下游及苦夷（库页岛）地区扩大势力，并先后六次远征印度洋周围各国<sup>②</sup>。尤其是郑和“下西洋”，乃是有名的南海远征，连同第五代皇帝宣宗时期（1430年）所进行的航海，共计七次，每次都派出官兵约两万七千人，巨船六十艘，从东南亚各岛经锡兰、印度西岸、波斯湾、阿拉伯南岸、红海直达非洲东岸中部，这次大规模远征，曾促使这个广大沿海地区大约四十个国家前来朝贡。由此，东南亚及印度洋沿岸许多国家都被划入以中国为首的东亚国际秩序之中<sup>③</sup>。

另一方面，明太祖至成祖时期（1368—1424年），在朝鲜半岛

---

① 勘合符：我国史书称为“符信勘合”，见《明史·日本传》，意思是进行贸易的执照。——译者

② 中村荣孝：《日朝关系史的研究》中卷，吉川弘文馆，1969年，第6—7页。

③ 费正清：《朝贡贸易与中西关系》，《远东季刊》，第1卷，第2号，1942年2月，第140页；马观：《瀛涯胜览》，小川博译注，吉川弘文馆，1969年。